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南国惊雷

1925年5月30日，上海人民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顾正红和逮捕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英租界巡捕开枪扫射，当场死伤数十人。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国内各地人民群众纷纷奋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和中国人民反帝革命风暴的到来。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东。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在广东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派人去香港、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去香港发动工人罢工，是个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呢？

大家考虑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有实践经验。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邓中夏同香港工会代表团中的各派工会负责人有广泛的接触，他们对邓中夏广博的知识，精辟的言论，敏捷的辩才，政治家的风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会议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邓中夏。

邓中夏来到香港，同在香港工作的广东工运领袖杨殷一起，找到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召开党团员会议，研究发动工人罢工的问题。

会上，邓中夏介绍了五卅惨案的真相。他说：“几十年来，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了向英帝国主义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为了推动革命高潮向前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发动一次大罢工。希望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为这次罢工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如何发动工人罢工，请大家提出意见。”

参加会议的人，对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罢工，信心不足。他们说：

“上级的决定，我们拥护。可是，就靠我们这一二十个人，能把香港几十万工人发动起来吗？”

“香港工会很多，大都是旧式的行会组织。拿最大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来说，会长谭华泽，就是个买办。这样的人，这样的工会，能跟我们走吗？”

邓中夏认为，从主观力量上说，要发动一次大罢工，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他说：“五卅惨案爆发之前，谁能想到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呢？目前，尽管我们有很多困难，但有利条件还是有的。比如，苏兆征领导过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工人中很有威望。在他的影响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会跟我们走的。另外，电车、华洋排字、洋务等几个工会，是共产党领导或受共产党影响的。我们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罢工是可以发动起来的。”

邓中夏继续说：“大家都知道，香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是非常仇恨的。仇恨，是埋在工人心中的炸药。现在，炸药还没有点着，大家还看不到它的力量。炸药一旦点燃，大家就会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要把炸药点燃起来，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二是从上边争取那些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

大家对邓中夏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只是对争取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参加罢工，有人觉得困难较大。

有人站起来问：“这些人，不是把头，就是买办，成天只知道敲诈勒索，喝工人的血。他们能参加罢工吗？”

杨殷说：“这些人，名利熏心。没有名，没有利，他们是不会干的。”

“对。”大家表示赞同。

邓中夏说：“这一点，我们已经估计到了。他们既然要名、要利，我们就抓住这一点做工作，给他们名、给他们利。他们参加罢工，就可以得到爱国的名声，也可以得到罢工经费的实利。如果他们不参加罢工，一旦工人跟着我们走，他们的名、利，也就完了。所以，争取这些人参加罢工，是完全有可能的。”

邓中夏的分析，合情合理，发人深思。大家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为发动罢工贡献力量。

香港的工会很多，派系复杂，乱如纷纭。邓中夏纵观全局，从这团乱丝中理出一个“头”。这个“头”，就是工团总会。

说工团总会是个“头”，有两条理由。第一，工团总会所属工会多，有70多个，占全港工会总数一半以上，对罢工有举足轻重之势。第二，香港的工会，很多都被黑社会头目控制。在香港发动罢工，必须取得这些头目的赞助才有可能。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交际部主任梁子光，都是黑社会中的头面人物。只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就可以影响其他头目。

从哪里下手呢？

邓中夏认为，苏兆征在海员中有很高声望。现在，他虽然不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但可以影响会长谭华泽，进而影响工团总会。

一天，邓中夏和杨殷专程拜访谭华泽。

谭华泽作为香港工会代表团成员，曾出席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见面，谭华泽就说：“那次大会，开得太好了。特别是邓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寒暄过后，邓中夏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来，有件重要事情，要与谭会长商量。”

谭华泽看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来找自己商量事情，十分得意，说：“只要能办到的，兄弟一定效劳。”

邓中夏说：“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最近，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发动大罢工，请谭会长大力赞助。”

谭华泽一听，显得很不自在，说：“兄弟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一定拥护。只是，罢工爆发后，如果英国干涉，出现上海那样的流血事件，怎么办？”

邓中夏说：“只要大家团结，齐心，英帝国主义就不敢怎么样。”

杨殷趁势捧谭华泽一句：“谭会长热心爱国，这次一定全力支持。”

谭华泽欲退不能，就来了个顺水推舟：“兄弟爱国不敢为人后。既是这样，我和会里同仁商量商量。”

邓中夏、杨殷旗开得胜，接着去找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

杨殷在香港工作期间，已经和黄金源交上朋友。他和黄金源介绍邓中夏，说明来意。黄金源张口就问：“罢工以后，各工会由谁领导？”

邓中夏就说：“罢工由各工会发动。罢工工人回广州后，仍由各工会自己管理。”

黄金源又问：“上面由谁领导？”

“准备组织一个总的领导机关，吸收各工会领袖参加。”

黄金源以为大权在握，有利可图，立即表示：参加罢工。

工团总会交际部主任、车衣工会会长梁子光，从捞取名利出发，也表示赞助罢工，并答应在车衣工会举行第一次工会联席会议，研究罢工问题。

邓中夏、杨殷、苏兆征、黄平工作顺利，由点到面，逐步铺开。在车衣工会举行的第一次工会联席会议，有电话、清洁、肉菜、电车、海员、机器等工会的负责人参加。会上，邓中夏讲了这次罢工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唯独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没有表态。

华人机器会，是香港英国当局的御用工会。邓中夏认为，尽管韩文惠反对罢工，但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会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便派了几个党团员去做工作。

过了几天，邓中夏又在车衣工会召开第二次工会联席会议，成立了罢工的统一指挥机构——全港工团联合会。各大工会的头头、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如黄金源、梁子光、谭华泽、胡荫、陈锦泉、冯敬、谭海山、刘汝泉、毛士珍等，都是这个机构的成员。

当邓中夏等领导人对工会的上层人士做工作的时候，每一个党团员、宣传员都包一个地方或者若干个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木匠工会的郑全，分工向持平工会的工人宣传。工人经常去西营盘巧心茶楼饮茶，郑全也早午必到。

一天，郑全在巧心楼讲五卅惨案的真相。一个工人听了，大骂英帝国主义。正在这里转悠的警察要抓工人。郑全挺身而出，严厉质问警察：“你是不是中国人？”

一向蛮横的警察，在工人义正词严的质问下，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

经过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人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罢工条件日渐成熟。

邓中夏转回广州，和陈延年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邓中夏说，这次大罢工，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英帝国主义。参加罢工的工人，不是1万、2万，将是几十万。现在，香港各工会的领导人，以及工人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罢工工人回广州后，食宿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是关系到罢工成败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笔经费。钱从哪里来呢？

陈延年和邓中夏一起去找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他们说明来意后，廖仲恺立即表示，坚决支持罢工，答应由财政部每月拨款1万元，作为罢工经费。邓中夏随即回香港组织、发动罢工。

6月17日，邓中夏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名义，在西营盘杏花楼茶居，召开工团总会所属各工会的群众大会，由苏兆征主持。

苏兆征说：“工友们！自从五卅惨案发生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我们香港工人怎么办？为了让社会人士知道我们香港工人阶级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现在，我做个发起人，号召工团总会的工人行动起来，实行罢工，向帝国主义提出抗议。”

苏兆征的提议，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会上，成立了“工团总会罢工发难委员会”。

第二天，邓中夏以“宴客”为名，在杏花楼茶居举行香港工团代表会议，通过罢工日期、宣言、要求，为罢工做好组织准备。

会上，苏兆征和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交际部主任梁子光等，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当场宣布，决定罢工。其他工会的负责人，也宣布参加罢工。但是，也有一些工会的负责人，对罢工缺乏信心，采取观望的态度。

6月19日，电车、华洋排字、洋务3个工会都宣布罢工了，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迟迟不动。

海员工会里，空气紧张到极点。

门外涌满着等待罢工的海员。

屋内，谭华泽坐在桌边，满头是汗，苏兆征在一边催促着下罢工令。

一些工人忍不住冲进大门，举起拳头，对着谭华泽叫：“电车、洋务工会都罢工了，我们为什么还不罢？”

“你到底下不下罢工令？……”

谭华泽见人们一个个怒气冲天，喊声把房子都震动了，吓得哆哆嗦嗦地说：“罢，罢，罢……”

一个海员叫：“罢就下罢工令，几个小时都过去了，你到底下不下？”

谭华泽脸色煞白，颤抖地说：“马，马上下，马上下……”

罢工的命令终于下了，码头边，海面上，所有的船像得了麻痹症，一下都停下了，横一条，直一条，像死鱼一样浮在水面上……

紧接着，起落货工会、煤炭工会……，陆续宣布罢工。没有下令罢工的工会，是香港华人机器会。因为邓中夏已派人去它所属的工会做工作，会长韩文惠虽然没有下令罢工，工人却自动罢工了。

香港政府慌了，连忙宣布戒严令。英帝国主义者们在街头、屋顶上架上机枪，连铁甲车也开了出来。到处传说英帝国主义要进行大屠杀。人们纷纷返回广州，一天达好几万。车站边，码头旁，到处睡满了等着走的人。

6月21日，广州沙面的工人也宣布罢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揭开了序幕。

二、珠江血案

1925年6月21日，沙面中国工人宣布罢工后，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不但饮我中国人民之血，而且食我中国人民之肉。不但榨我等之血汗，而且取我等之生命。其压迫我中国人民，始则金钱，继则枪炮。今日我中国人民手足被缚，非自己解放，无人为我等解放。……上海、汉口、青岛市民及工人，一日不胜利，我等一日不返工。为上海案而奋斗，为解除我等自身痛苦而奋斗！”

沙面罢工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市内英、日、美洋行工作的职工，于24小时内，一律停止工作；在其他国家洋行工作的职工，继续工作，实行月薪捐款。100元月薪的，捐款5元，作罢工经费。

沙面，在珠江岸边，与广州仅一河之隔，是英、法等国的租界。

沙面工人罢工后，英、日等国开来8艘军舰，停泊在沙面附近的白鹅潭海面，给广东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还派水兵登陆，控制沙面的高楼楼顶和交通要道。

早在6月17日，广东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通过援助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办法17条。

广东各界对外协会，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6月22日，各界对外协会召开执委会议，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郭素正主持。会议决定，6月23日，在东校场召开广东各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各界对外协会还致函省长公署，通告该日一律停业，以便各界群众参加大会的游行；自该日起，广州全市下半旗，市民臂缠黑纱7日，以示哀悼。

23日，罢工回到广州的香港、沙面工人，和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约十万人，手持“援助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小旗，陆续开进东校场。

大会分3个会场。中间是工人、农民会场，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主持。左边是学生、商界会场，由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长伍朝枢主持。左边为军界会场，由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主持。

12点整，大会开始。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后，谭平山宣布大会结束，示威游行开始。他说，上火线打反革命派的时候，军人是民众的前锋。今日游行，是文明示威，军人当为民众后盾。游行队伍的排列是：工人、农民、学生、商民、军人。

游行队伍，以工人为前导，浩浩荡荡，从东校场出发，由惠爱路转入永汉路，经西濠口，来到沙基。群众高喊口号，队伍整齐，秩序井然。

沙基与沙面，一河之隔，河上有东桥、西桥两座，把沙基与沙面联系起来。这时两桥交通已经断绝。沙基属广州第九区警察署管辖。九区二分署署长何元钧，率领警员，分别在沙基两面的东、西桥下维持秩序。

3时20分，当工人、农民队伍走过沙基，转入内街，学生队伍来到沙基调元街口的时候，沙面域多利酒店楼顶的英国士兵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岭南大学教师区励周和学生许耀章当场被打死。跟在岭南大学队伍后面的坤维女中、第二高小的中小学生也遭枪击，许多学生受伤。

英国士兵听到域多利酒店的枪声，立即用机关枪向沙基的游行群众扫射。停泊在白鹅潭海面的英、日军舰，也开炮向沙基射击。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党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代营

长蒋先云率领的第二连、第四连、第七连，一进入沙基，就遭到沙面方面的机关枪扫射。

沙基是一条开阔的马路，队伍没有地方隐蔽。蒋先云命令全体官兵，以行人道的柱子作掩护，监视沙面的动向。

第四连代理连长宋希濂向蒋先云报告，他的队伍走到东桥斜对面的沙基街头时，遭到东桥上的英国士兵射击。各连官兵，满腔义愤，一致要求蒋先云下令还击。

蒋先云，本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曾参与领导著名的安源大罢工。还领导过湖南水口山矿工工人大罢工。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现已成长为军事指挥员。

这时，蒋先云考虑到，眼前发生的惨案，是国家大事，不是几个连的兵力所能解决的。况且，英国士兵都有洋房、沙包作掩护，靠步枪火力是不能杀伤他们的。蒋先云当机立断，大声下令：“不准开炮！”

英国士兵仍在射击。黄埔军校党军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曹石泉，第二排排长义明道、陈纲，被机关枪射中，当场牺牲。传令兵许国良受了重伤。蒋先云脚也被弹片擦伤。他说：“革命军的职责是救国救民，我们要继续掩护群众走避。”

下午4时，大雨倾盆，沙面方面才停止了射击。

据救护队统计，在沙基惨案中，有54人被打死，117人受重伤，轻伤的不计其数。

英帝国主义者制造了沙基惨案，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英国领事杰弥逊照会广东国民政府，声称这次事件，是黄埔军校学生军“首先开枪，至百响之多”，沙面方面才“不得不还击”。

蒋先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6月23日沙基惨案报告》，予以驳斥。

蒋先云说：“我是23日沙基惨案最后离开帝国主义者虎口的一个，同时亦是被机关枪射击幸而不死的一个。惨案的经过，身受目睹。今陈述其经过的实在情形，以证明帝国主义的阴谋。”

接着，蒋先云说：“我们正行到沙基街，前面即有枪声，沙面之帝国主义者已开枪射击前面之学生。于是，在军队前面之学生及工农，皆仓惶逃避。我等对面的机关枪及步枪，皆向我射击。始则枪声霹雳，继复枪声隆隆，知外舰亦已向我开始射击。”

最后，蒋先云说：“英帝国主义者反辱相加，谓系我黄埔学生军开枪在先。然我学生军决非至愚。若真要杀帝国主义者，岂肯使我手无寸铁之工农商学同胞先行，送与帝国主义者屠杀？且当日军队，皆用四路纵队而行。若真要杀帝国主义者，当先知帝国主义者亦必杀我，又岂肯用密集队形前进，至受莫大损伤！……帝国主义者嗜杀弱小民族而不负责，甚至反唇相加，是可忍，孰不可忍！除已报告所属长官外，谨此报告，希转呈政府以为交涉之一份佐证。”

在沙基维持秩序的第九区警察署二分署署长何元钧，也以自己目睹的实情，向上级写了报告。

何元钧说：“2时15分，巡行大队到来，都严守秩序，沙面内有外国人全副武装站立观望。巡行者虽高呼口号，但并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所以安然无事。在3时20分，巡行大队前队已过去八九成。工人、学生将随后转入内街时，沙面外国人忽然躲避起来，学生正到沙基调元街口附近之际，沙面域

多利酒店楼上，不知什么原因，竟开枪向巡行群众射击。而英国工部局一听到枪声，就用机关枪向沙基一带射击。不一会儿，沙面射击的枪声如连珠炮。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也开枪向北岸射击。我巡行各队，均纷纷走避，并无还枪射击，而他们竟开枪一小时之久，也没有停止，以至于我方民众死伤众多。……为些市民大巡行，也只求伸张公理，并无越轨行动。而沙面内凶徒，竟无故开枪射杀我国多人，实在是横暴已极。”

7月11日，广东各界人士举行沙基惨案烈士公祭大会。参加的有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100多个团体，约10万人。大会庄严、隆重。主祭人献上红花数朵，放在54位死难烈士灵前，并宣读祭文，表示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同帝国主义战斗到底。

三、战斗堡垒

沙基惨案，是英帝国主义对省港大罢工的武力镇压。但是，洋枪洋炮没有吓倒省港工人，反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到 1925 年 6 月底，香港的罢工工人就达 25 万。

省港罢工初期，面临着一个形势复杂、斗争险恶的局面：既要和英帝国主义以及各种反动势力对于省港罢工的破坏作斗争；又要妥善解决罢工队伍内部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统一反帝斗争的认识的步伐，保证有效地进行反帝罢工斗争，因此当时的首要大事，就是必须迅速建立一个坚强和健全的组织。

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和李森等人积极投入了建立罢工领导机构、健全罢工组织的工作中。他们根据运动领导罢工斗争的实践经验，决定建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为团结广大罢工工人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指挥部。

但是，建立一个坚强健全的罢工领导机构，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其中贯串着一系列的复杂斗争。当时，香港工团总工会会长黄金源、交际部长梁子光等，在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千方百计地想把罢工领导权抢到自己手中来，以使罢工中途夭折。他们先是反对组织罢工委员会作为统一的指挥部，主张香港、沙面各设一套机构，各行其事。他们极力反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于罢工的领导，实际上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图把这场罢工置于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的控制之下。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问题上，他们又反对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正确主张，提出要以工会为单位，无论工会大小都一律选举同等数目的代表，这样，他们就可以占据多数名额，从而操纵工人代表大会。

针对这种情况，邓中夏、苏兆征等对他们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告诫他们不要闹分裂，应以反帝斗争大局为重。在问题处理上，邓中夏等对于一些原则性问题就毫不让步，但对一些非原则问题则适当迁就。例如在坚持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罢工委员会同时，可以保留一些黄色工会头目当负责人的香港工团联合会等组织，让他们在不违反罢工斗争利益的情况下继续活动，从而分化瓦解反对势力，团结了广大罢工工人，同心同德地进行反帝斗争。

经过一再宣传教育，终于通过了由香港罢工工人方面选出苏兆征、何耀全等 7 名代表，沙面罢工工人方面选出曾子严、黎福畴等 4 人为代表，再加上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林伟民、李森两人，一共 13 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

7 月 3 日，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在林伟民主持下，罢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进行选举，大家一致推选苏兆征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为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汪精卫、邓中夏、黄平等为顾问。

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处理罢工委员会日常事务；财政委员会，筹措及管理罢工经费；纠察委员会，指挥工人纠察队；保管拍卖处，保管拍卖工人纠察队截获的仇货；审计局审核各部门的开支帐目；会审处，处理破坏罢工的案件；拘留所，关押破坏罢工的犯人；劳动学院，培训香港、广东的工会干部；工人医院，给罢工工人治病。省港罢工委员会还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之路》。

黄金源不得人心，没有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邓中夏把他安排在纠察委员会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干事局局长一职，事务繁重，责任重大，管理一二十万人的衣食住，经手很多钱财物。梁子光认为，这是个大有油水的差事，眼睛直盯着它。

一天，梁子光气呼呼地对邓中夏说：“现在外边议论可多啦！大伙都说李森怎么能当干事局局长呢？应该由发动罢工的人担任嘛！大伙还说，这次罢工，功劳最大的是香港的工会，人也多，可是回到广州，根本瞧不起我们，这叫什么事？”

邓中夏看透了他的来意，便笑着说：“这次，很多工会领袖，连你在内，都还没有很好安排工作，罢工委员会正准备好好研究一下。”

事后，邓中夏对李森说：“这只是梁子光少数人在那里兴风作浪，群众是不会投他们的票的。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看还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明天由你主动向罢委会提出辞职，推荐梁子光来代替……”

李森笑了笑，同意了。

果然，李森向罢委会两次辞职，但都被大家挽留了。

这一来，把垂涎干事局长位子的梁子光气坏了。他们捏造的谎言，被彻底揭穿了。

后来，为了团结、照顾这些人，罢委会安排梁子光当了招待部主任。

梁子光仍不罢休。8月8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罢工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正在代表会上报告工作，梁子光突然站起来，污蔑罢委会有受贿行为。苏兆征立即在会上作了解释。可是梁子光不但不听，反而在台下起哄。顾问黄平为了维持秩序，出来讲了几句话。梁子光竟趁势鼓动打手，说顾问骂人，冲上去要打，搅散了大会。

第二天，他不甘心，又纠合一班人，召开全港工团委员会，想把事情闹得更大。机器工人彭明，在会上说了几句公正话，当场遭到毒打，幸亏跑得快，才没被打死。

邓中夏得到消息，当晚，召开了党团会。大家分析梁子光有更大的野心，是要阴谋推翻整个罢委会，便决定给以有力的回击。

在又一次代表会上，让彭明带着伤，揭露梁子光的阴谋活动，群众听后，气愤，一致通过决议，宣布梁子光等人为工贼，并把几个打手抓了起来。这一来，梁子光害怕了。最后，终于在会上公开承认了错误。

从此，梁子光等人的气焰再也嚣张不起来了。

罢工工人组织起来以后，显示了很大的威力。每逢开什么大会，有什么群众活动，他们总是打着大旗，敲着锣鼓，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去。平时，各个码头、要道口，经常站着扛枪实弹的工人。大街上，一队队威的纠察队，整日里走来走去，到处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

那时，罢工委员会的办公地址在东园，这是过去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一个游乐场所，罢工后，成了罢工委员会的总指挥部。罢委会完全采取民主集中制，体系相当严密而灵活，就像一个小小的政府——由工人阶级掌握的红色政权。因此，人们就称之为“东园政府”。帝国主义为了挑拨政府和工人的关系，也趁机散布说广东有两个政府。这一来，果然引起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慌乱。

邓中夏听到敌人的挑拨，立即进行批驳。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为了揭穿敌人的诡计，他说：“大家知道，东园是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所在地，罢委会主管的一切，都是与罢工有关的，从来没有代替政府，也没有行使过政府的职权，帝国主义这种说法，不过是想挑起

政府和工人的分裂。我们要彻底粉碎他们的罪恶阴谋！”

后来，在工人代表会上，他又充满自信地说：“当然，敌人既然说我们是第二政府，这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应该知道，我们工人阶级，是要有自己的政府的。今天的大罢工，就好比是一所试验工人专政的大学堂，它训练我们怎样管理国家，怎样掌握政权。你们看，现在我们有“群众”、“团结”、“奋斗”、“胜利”四只军舰，它好比是我们的海军。有几千工人纠察队，它好比是我们的陆军。还有罢委会，作我们的最高的领导机关。有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我们的最高权力机关。还有《工人之路》报、医院、学堂、食堂等等的一切……。现在，我们在广州一地，好像是个小鸡，慢慢培养、发展，就会成为一个大鸡，大鸡慢慢又会生出许多小鸡，小鸡慢慢又会变成许多大鸡，就这样越来越大，越变越多，就可以一步一步发展到全国各地！”

全体工人代表听了，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兴奋。

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在整个罢工期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战斗堡垒。

四、工农联合

邓中夏在总结上海罢工的教训时说“上海五卅运动没有取得什么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出卖，小资产阶级的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孤立，无产阶级没有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

工农联合问题，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就已作出《工农联合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

然而，五卅运动爆发后，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行，把争取农民的事也丢在一边，这引起邓中夏极大的愤怒。

省港罢工以后，邓中夏非常重视工农联合问题，号召工友们到农民中去，加强工农团结，展开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当时，回到广州的25万罢工工人，其中半数以上的工人回到故乡，参加农民运动，有的成为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然而，在罢工斗争中，要真正实现工农联合，共同对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省港大罢工一个重要的决策，是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

由于历史的原因，沿封锁线的农民，同香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把农产品销往香港，又从香港买回农用物资和日用工业品，历来如此。现在，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后，农民的农产品销不出去，需要的东西买不回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而封锁香港，又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否则，工人纵然有天大本领，那漫长的封锁线，是封锁不住的。该怎么办呢？

1925年7月28日，邓中夏在《工人之路》发表《怎样实行工农联合》一文，提出自己的见解。

邓中夏说：“‘工农联合’这一个口号，自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已经普及于全体工友，个个都认为是我们解放路程上所必须采取的策略了。”

接着，邓中夏说：“可惜这一次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农友们因为地理上所限，尚不十分明白，有时有少数农友为了一点私利，偷运粮食出口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派人到农村去宣传，自然可以借此纠正少数农友的错误行为，也可以从此结成工农阶级的联合基础。”

最后，邓中夏说：“广东省农民协会要我们派出工友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两周，随即出发。这是一件很急切很有价值的事，热心的工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省港罢工委员会同广东农民协会商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为期半个月的罢工工人训练班，培训农民宣传员。

一天，几个工人跑到罢工委员会来找邓中夏。

邓中夏正在给《工人之路》写评论，抬头见他们一个个笑容满面走来，便问：“什么事这么高兴？”

一个叫老方的工人，兴奋地说：“邓顾问，我们快要走了，是特地来向你辞行的。”

“上哪儿？”邓中夏奇怪地问。

“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老方得意地看看伙伴，“学半个月，我们就要

下乡了。”

邓中夏欣喜地说：“呵，太好了，去搞农民运动，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苦呢。”

大家笑着说：“不要紧，都准备好了，不完成任务坚决不回来！”

邓中夏兴奋地看着大家，深情地说：“是的，农民是我们的同盟军，他们受的痛苦与我们的工人是一样的。这次下去，要很好地团结、组织他们。”

罢工工人带上《工人之路》报、传单、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和其他宣传品，深入到中山、顺德、南海、番禺等十多个县，协助当地的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自卫军，发动他们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封锁。许多罢工工人还组织了剧团，分头到农村作巡回演出，激发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在罢工工人广泛的宣传、组织下，各地农民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农会，展开了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有的夺回了被克扣的粮食，有的没收了土豪的公堂，有的甚至缴掉了反动民团的枪支。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罢工工人不辞劳苦，不怕困难，刻苦工作，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为了解决封锁香港同农民的矛盾，照顾农民的利益，省港罢工委员会颁布《特准宝安农会农民经过英界条件》，准许农民去英界购买化肥、米、盐，还准许农民带着耕牛去英界耕种花田。

省港罢工委员会还给工人纠察队委员会发出《关于咸鱼运输办法的训令》，解决沿海农民、渔民吃咸鱼的问题。

由于省港罢工委员会认真解决封锁香港同农民的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第一次实现工农联合。这种工农联合，经过战斗的洗礼，发展成为工农联盟。

五、封锁政策

1925年7月9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实行封锁香港通电》。

第二天，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便开赴沿海各港口，实行武装封锁，断绝广州至香港的交通，严禁粮食、农副产品运往香港。

广东国民政府支持省港罢工委员会封锁香港，把铁甲车队调到深圳驻防，协同工人纠察队实行武装封锁。国民政府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抵制英货运动，严禁英货入口，一经查出，充公处罚。

在纠察队严密的封锁下，香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市场上一片混乱，粮食、副食、蔬菜来源断绝，价格一日数涨。猪肉涨到1块多1斤，鸡蛋5毛多1个，而在先前，5毛可以买15个鸡蛋。由于食品奇缺，香港成为“饿港”。

中国工人走了，英国老爷、太太，只得自己洗衣、做饭、抱孩子、倒尿盆……，连街上卖肉的都是外国佬，狼狈得要命。过海的交通停了以后，英帝国主义只得调海军来代替。可是这些笨手笨脚的外国佬，连个火轮也开不好，东碰西撞，也靠不上岸，最后只好用铁缆来绞，把围在一边看热闹的中国人笑坏了。最可笑的，是爬山的缆车停了以后，外国人每天上下班，只好自己走。有的身子太胖，上山走不动，只好叫差人打个藤椅跟在后边，走一段，歇一段。

香港本是世界上繁荣的商埠之一，如今，商店歇业，轮船停驶，输出入货物减少一半还多，到港船减少80%以上。由于对外交通几乎断绝，香港成为“死港”。

香港的街道，由于工人罢工，无人打扫，垃圾如山，黑色的臭水泛起白沫在街道上横流。更好笑的是，香港出现了一种非常厉害的新式武器，叫做“飞天屎”。原来，马桶没有人倒，住在高楼上的人家只得把屎拉在纸里，从窗户里扔下去，谁要走在街上不当心，就会挨一脑瓜屎，简直叫人胆战心惊。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香港弄得遍地是屎，臭气冲天，成了名副其实的“臭港”。

几个月下来，英帝国主义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可是由于封锁，外边的货物运不进来，广州本身也遭到了困难。粮食不足，燃料缺乏，物价上涨，到处可以看到市民在抢购东西。市场上，不少货架空了，商人的营业受到严重的影响。人们的情绪开始波动。罢工初期，各处茶楼、酒馆墙上贴着“欢迎反帝罢工回国工友”、“优待罢工工友到本楼饮茶”的标语、招贴，现在也渐渐不见了。而且，到处传播着商人对罢工的怨言。说什么“商人赔本了，万岁友发财了！”（“万岁友”是一些商人、市民对罢工工友的轻蔑称呼，因为他们开会、游行时，经常喊“万岁”。）“这一下可把我们生意人害苦了！”有人甚至恶毒攻击说：“什么封锁？简直是借故勒索！”

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对广州的联合封锁，更增加了工人们的困难。罢工遇到了严重的威胁。

邓中夏、苏兆征、陈延年等人决定去找苏联顾问鲍罗庭，商量解决办法。他们经过东校场，向东山一座小洋楼走去。

鲍罗庭穿着一身灰色西装，留着黑黑的大胡子，在屋里愉快地接待了他们。他是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是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时，从苏联请来帮助中国革命的。

陈延年向鲍罗庭说明了来意。

鲍罗庭抽着烟斗，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近来，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鲍罗庭走到窗边，考虑了好大一会儿，转回身，从嘴里取出烟斗，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封锁，是个厉害的武器，”他见桌上放着一把裁纸的尖刀，轻轻拿起说：“它好比一把锋利的剑，两边开了口，一边伤害了敌人，一边也伤害了自己。”

大家听到他恰当的比喻，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鲍罗庭严肃的说，“敌人的物资被封锁了，我们自己也被困住了。怎么办？只有把这把刀转一下，把柄转过来，让刀尖对准香港，对准英帝国主义……”

他把手里的刀转个方向，使刀尖对外，刀柄对着自己的胸部。

大家被吸引住了。

鲍罗庭把手轻轻一挥，充满信心地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对准英帝国主义！对准主要的敌人！具体地说，就是实行这样一种新策略：各国的船和货都可以进来，就是英国的船和英国的货不让进！”他的脸上荡起了笑意，“这样一来，既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又保证了广东物资的供应，商人有了生意，农产品也有了出路，省港罢工就可以更巩固了！”

大家高兴地笑起来。

苏兆征欣喜地说：“这个办法，真是太妙了！”

邓中夏恍然大悟，暗暗想道：“看来，原先‘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做法，从策略上来说，是错误的了。”罢工初期，有人提出“单独对英”的口号时，他还曾激烈反对呢。

通过邓中夏、苏兆征在党团员和群众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大家的思想统一了。

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设立特许证的通告》，规定：“凡非英国产品及不由英国船只又不由香港运来者，一律准发给特许证。其所有领到特许证，准其存入非英国货仓，并准其出仓。”

“单独对英”策略，拆散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阵线，孤立了英国。华南一向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广东市场完全被英国把持。现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实行针对英国的“特许证”制度，在日、美、法等国看来，这是在广东市场上取代英国的大好时机。各国的公司、洋行、商船，纷纷前来广州。他们为广州送来了大量的粮食、煤炭、石油……。

自实行“特许证”制度后，广东的经济摆脱了香港的控制，得到了独立发展。广东的商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州不仅与海外建立直接交通，而且因为封锁香港，内地从香港采办货物的，也改为在广州采办，广州的批发商业因而得以骤然兴盛。这样促进了工商联合，广东商人不但不反对罢工，还积极支持罢工。

罢工得到了有力的巩固。

英帝国主义更加头疼了。

六、肃清内奸

由于新策略的推行，经济危机是缓和了，但是另外一个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化。

那时，广州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军阀陈炯明占据了广东东江，邓本殷盘踞琼崖等地，他们拥有十几万人的反动军队，时时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此外，广东内部的派系斗争也非常激烈。在省港罢工工人支持下成立的广东国民政府，其内部主要分成三派：一派是以许崇智为首的广东系军官；一派是以国民党元老、右派头子胡汉民为首的官僚政客；一派就是以财政部长廖仲恺等为首的左派国民党党员及支持他们的工农势力。三派之间的斗争一天比一天尖锐。英帝国主义趁此机会又给江门反动军队运来了新兵器，以 200 万元暗地资助胡汉民、许崇智发动政变。在这种形势下，反动分子更加猖狂，在各地大肆攻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散布谣言，说广州要“没收财产”、“共产共妻”，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军队中的争权夺利也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整个广东，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险，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工人时常受到内部反革命的挑衅。罢工委员会不断接到各地送来的报告，一会儿江门纠察队被军警包围，一会儿纠察队截留的货物被军队强行劫去，一会儿又传来某某地方的工人被不法之徒打伤、打死。政客、军人勾结英帝国主义，武装走私和抗拒检查的事，更是一件接着一件……

一天深夜，邓中夏匆匆来到罢工委员会，找苏兆征商讨时局。

邓中夏有点焦虑地说：“兆征，最近的形势很严重呢！”

苏兆征问：“是陈炯明要打广州么？”

“不，”邓中夏摇摇头说，“国民政府内部的反革命，最近越来越嚣张了，到处找工人闹事，和我们作对。今天又发生了好几起，听说竟然向纠察队开起枪了！”

苏兆征说：“这一定是一些军政要人在背后策动的。”他压低声音问，“听杨殷说，胡汉民、许崇智最近要搞政变，是真的么？”

邓中夏点点头说：“我正为这事来找你。方才区委开了个会，大家认为，国民党左派摇摆得很厉害，时局已经非常危险，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支持他们！”

苏兆征说：“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我们怎么插手呢？”

邓中夏果断有力地说：“可以壮壮他们的胆子！我想，是不是你给《工人之路》写一篇文章，彻底揭露右派的阴谋。我呢，争取在群众大会上作一次公开讲演，这样从两方面同时夹击，你看好么？”

苏兆征果断地说：“行！”

1925 年 8 月 7 日，苏兆征在《工人之路》发表了《肃清内奸》一文，揭露了打着国民政府的旗帜，实际上暗中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内奸。

苏兆征说：“我们冒重大牺牲而从事爱国之大罢工，外国人尚予以同情和援助。然而所谓‘同胞’竟甘为帝国主义爪牙，可恨孰甚！因此，我们要下决心，先行肃清内奸，然后罢工可保，帝国主义可打倒。”

8 月 11 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各界人士 10 万人举行肃清内奸大示威。

在辽阔的东校场上，涌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压压的，像大海似的一眼望不到边。数不清的旗帜，在空中呼啦啦地飘着。

高大的椰子树下，每隔 10 步，站着 1 个纠察队员，他们个个全副武装。广场正中，是一人高的用席子和竹子搭起的大讲棚，周围也挤满了人。

人们用大车把成堆的宣传品，一车车拉进会场，向争着涌来的群众散发。会场里，到处飞舞着白色的小册子和红绿传单……

会议在进行着……

邓中夏站在大讲台上，一针见血地提出了问题。

他说：“香港英帝国主义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向我们叩头、屈服呢？是以为我们经济困难吗？不，帝国主义知道我们的经济是不成问题的。那么，是我们的组织不好吗？也不是，我们罢工的组织，可说是再好也没有了。是我们人心不齐吗？更不是，自从罢工回来以后，我们全体工友个个同心同德，没有一个动摇的。是我们工人孤立无援吗？也不是，我们有革命政府的帮助，农、商、学界各方面的支援，连外洋华侨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那么，帝国主义为什么还是不屈服、不退让呢？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有汉奸，有走狗，有反革命！”

人群里起了微微的骚动。

邓中夏大声疾呼说：“最近香港政府，花 80 万银洋，收买邓本殷，要他给香港运粮，并且出兵打我们。在东江，收买陈炯明，要他向广州进攻。我们封锁海口以后，还有不少形形色色的小军阀，替帝国主义包运粮食。他们在江门，攻打我们的纠察队。在江门，强夺我们截获的仇货！”他那双乌亮的眼睛燃烧着愤怒的光芒，激烈地挥了一下拳头，“我们为了制敌人于死地，想尽办法截留粮食，他们却为敌人包运粮食！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打倒帝国主义；他们却或明或暗地帮助帝国主义！我们罢工罢了这么久，帝国主义所以不屈膝，就是因为这些汉奸，这些走狗，这些卖国贼！”

人们激动起来。

邓中夏的脸涨得通红，有力地结束了他的话：“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先肃清内奸！我们要求肃清南路，收复东江，我们要求政府铲除一切反革命！”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示威游行开始了，群众一批一批地涌出广场。罢工工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边是学生、市民、农民……人们敲着锣鼓，举着大旗，扛着肃清内奸的漫画，走在南方炎热的街道上。口号声响彻晴空。化装演出队表演的英帝国主义和陈炯明狼狈为奸被打得落花流水等节目，激起了人们热烈的掌声。

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宽坦的惠爱路转临越秀路，涌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门。

“打倒帝国主义！”

“铲除一切反革命！”

“解散不法军队！”

口号声一个高过一个。

示威给予国民党人很大的震动。

但是，由于国民党左派过于软弱，始终不敢动手，形势发展越来越严重。

8 月 20 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当场被捕的凶手陈顺供认：暗杀的人物除廖仲恺外，还有鲍罗庭、谭平山、蒋介石、汪精卫及共产党人周恩来、陈延年等。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立了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 3 人组成的特别委

员会，查办廖仲恺被刺案。很快就查明，组织这次暗杀行动的主犯是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胡毅生是胡汉民的亲兄，魏邦平是许崇智的嫡系部下。这些要犯的后台是谁，就不言自明了。

国民党左派这才下定决心，解散魏邦平的部队，下令捉拿胡毅生、朱卓文，让许崇智“请假赴沪”，胡汉民“出使苏俄”，离开广东。从此，国民政府就由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执政。

此时，广州的形势仍然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东江的陈炯明攻陷了惠州，南路的邓本殷猛攻江门，中山县又被土匪占领，北洋军阀的军舰又和英帝国主义勾结南下，窥视虎门……

在省港罢工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国民政府于10月1日命令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南讨邓本殷。3000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发。工人纠察队第三大队随同东征军上前线，参加战斗。

在远征途中，罢工工人肩挑重担，跋山涉水，把武器弹药，粮食给养输送到前线，有数十人英勇牺牲。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援下，11月5日，东征军攻克潮汕，彻底肃清陈炯明残部；11月25日，南征军攻克高雷一带，消灭了邓本殷的主力，并横渡南海，攻入琼崖。前后不到3个月，东征南征获得全胜，广东统一了。

七、审判洋人

在邓中夏、苏兆征及同志们的斗争下，罢工委员会内部也进行了不断地清洗、整顿，除去了坏分子，增强了战斗力。

由于罢委会越来越巩固，各处海口的封锁，也越来越严密了。工人阶级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自己的巨手卡住了敌人的脖子。英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挣扎，想尽了各种办法，组织走私和偷运，几乎每天与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

其中，以白鹅潭的斗争最为激烈。

白鹅潭，水面宽阔，处在市区内，交通便利，经常停泊着许多外国的大商船和英国的军舰。它的北边挨着沙面，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地。罢工爆发后，沙面被封锁了，粮食、蔬菜进不去，英帝国主义就活动一些土匪从乡下走私偷运。纠察队发现拦截时，英帝国主义就出动军舰援助。因此，这里时常有枪击、夺船的事发生。

一天，邓中夏和苏兆征等正在罢委会研究问题，一个队员急冲冲地跑来。

“报告！”他气喘吁吁地说。

“出了什么事？”邓中夏问。

那个队员竭力镇静地说：“今天早晨，我们正在白鹅潭执行任务，江面上开来一艘英国轮船，我们的支队长陈剑夫马上派了几条电船，在附近巡逻，不让任何船只靠近那只英国轮船。一个上午过去了，没有动静。中午，忽然从沙面冲出一条快艇——”

“呵！”大伙瞪大眼睛。

“那只快艇，尾巴上挂着英国国旗，像箭一样直向轮船驶去。陈剑夫发现艇内有中国人，一声号令，所有的电船，一齐开足马力，围了上去。”

“好！”邓中夏赞扬道。

“这时，”队员说，“那条快艇慌了，忙向附近一艘英国兵舰求援。兵舰上就开了枪。大伙气坏了，也集中火力射击快艇，不让它靠近兵舰。这时，芳村、西壕口的纠察队也赶来了，打得很激烈。”

“结果呢？”苏兆征关心地问。

“最后，快艇害怕我们用火力围攻，只好老老实实地开到江边。陈剑夫和大伙上去搜查，有3个私逃香港的中国人，还抓到一个肥胖的洋鬼子。”

大伙高兴地笑起来。

队员向邓中夏请示：“那个鬼子咋办，能押起来吗？”

旁边，一个职员迟疑地说：“这事会不会引起国民党的交涉和外交纠纷？”

邓中夏严肃地反问：“他是不是偷运？”

“是。”

邓中夏果断地说：“既然是偷运，是破坏罢工，就可以抓！中国人破坏罢工，我们可以抓。外国人破坏罢工，我们也可以抓。外国人有什么好怕，不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过去中国人一直受欺侮，有人养成一种奴隶心理，老是觉得外国人可怕，今后不能再怕外国人！明天，叫彭明好好审审他！”

队员点点头，大声说：“是！”

陈剑夫听到队员的传达，就和几个队员，把那个鬼子五花大绑，押上了路。

那时，抓住一个洋鬼子，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人们不要说见，连听也没听说过。许多人得到消息，都跑来看热闹。

鬼子狼狈地在大街上走着，后面跟着许多孩子嬉闹着、叫骂着。

审判时，彭明和一个审判员坐在桌边，后面，坐着各工会派来的十几个会审委员，四周是纠察队员，看审问的人都挤在木栅外边。

那鬼子被带上来，一看都是普通工人，有点瞧不起，把头一抬说：“要审，可以让政府审。”

彭明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要到哪里去？你犯的是破坏罢工罪，就得在这里审问！”

鬼子没想到工人法官如此厉害，吓了一跳，连忙服服贴贴地低下了脑袋。

彭明问：“你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鬼子胆怯地说：“开，开电船的。”

“开船干什么？”

“把中国人送上去香港的船，一个人给、给 100 多块……”

陈剑夫在一旁火了，大声地说：“你简直该死！”

鬼子吓得直哆嗦。

大伙乐坏了。

彭明又问：“还干些什么？”

“有时也给沙面运，运些白菜。”

彭明严厉地问：“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

鬼子吓得要哭，忙说：“下回，下回决，决不敢了！……”

八、火烧东园

经过同内部、外部敌人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斗争，罢工队伍变得越来越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了。资产阶级害怕起来。加上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左派表现得很软弱，作了许多让步。会后，右派从上海、北京等地纷纷归来，形势变得越来越严重。到处充满了流言蜚语。

3月20日，广东政局风云突变，发生“中山舰事件”，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派军队逮捕了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缴了中山舰的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清除了共产党员，踢开了汪精卫，独揽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从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上台了。

事后，蒋介石假惺惺地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本人更是热烈拥护罢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他还把枪械发还给工人纠察队。

国民政府内部的右派分子勾结帝国主义，采取各种阴谋活动，妄图瓦解罢工。

一天，苏兆征正在召开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忽然听到街上响起“当当当”的救火车声。

有人匆匆跑来说：东园着火了。

苏兆征大吃一惊，连忙宣布暂时休会，人们涌出会场，向东园方向跑去。只见远处浓烟滚滚，火焰冲天。

等大家赶到东园，到处是忙碌的人们。看来已起火多时，整个东园已烧得差不多了。会审处、监狱、饭堂毁了一大半，只有纠察委员会的洋房还往外喷着一团团大火，别的总办公室、法制局、审计局只剩下一堆堆黑灰和残烟了。

人们望着眼前这悲惨的前景，心痛得说不出话。

东园——这几十万罢工工人的总指挥部，过去是一片庄严、火热的景象！而今这“工人政府”的革命圣地，竟化成了灰烬，怎能不让人悲痛和激愤呢！

会计部的同志们，急于在瓦砾堆上寻觅着，想找到他们装款项和单据的保险柜，可是，奇怪得很，连影子也找不到。他们痴痴地望着那几根烧焦的柱子，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

保险柜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就在这时，传来了恶毒的谣言：说这把火与苏兆征有关，因为他是财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为了营私贪污，就串通了会计部主任。这场大火，就是为了消灭罪证……

不明真相的人被弄糊涂了，有的也跟着瞎嚷起来，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甚至有人指名骂起苏兆征来：

“姓苏的，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这小子，是想发财、讨小老婆哩！……”

就在这时，苏兆征和陈剑夫赶到了。

苏兆征冷静地看看大伙。

人们紧张、关切地望着他。

苏兆征以最大的毅力，压制着内心的冲动，声色俱厉地说：“苏兆征有小老婆，谁要送给谁！可是有一条，苏兆征的大老婆，谁也不许动！”

骂人的那个人把头低下了。

苏兆征接着大声说：“先别说这个。大家赶快救火！东西能抢出多少就抢出多少。”

大家分头动手忙起来。

这时，一个工人暗暗想道：“保险柜又不是木头的，不会烧得连影子都没有呀！”这才想起会计部的房子是用竹子、席棚搭在河面上的，地板烧了，保险柜准是掉到河里，四下一摸，果然保险柜在那儿，便高高兴兴地扛上来。大家正要把款项、单据拿出来，只听后边一声大叫：“别动！”人们全愣住了。

大家回头一看：是苏兆征。

苏兆征走过来，温和地解释道：“我们是对全体罢工工人负责。有人骂我们，不要紧。我们只要求全体罢工工人信得过我们。”他对站在周围的人们说：“我建议，立即组织一个查帐委员会，来审核帐目！”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就在这时，邓中夏也匆匆赶来了。

他和苏兆征在现场转了一圈，到处是一片黑糊糊的灰烬，什么都烧光了。

邓中夏问苏兆征：“火是怎么起的？”

苏兆征说：“我们都在开代表会，弄不清楚。”

彭明从人堆里挤出来，说：

“今天下午，大家去参加代表会了。一部分人到江边，运苏联送来的军火。东园已经没什么人了。这时候，我正在会审处办一件案子，忽然听到外边有人叫：“失火了，失火了！”

我忙跑出去一看，见罢委会总办公室那边，冲出一团黑烟，接着，窜出火苗。我正在吃惊，只见后面跑出一个生人，神情慌张，手里拿着什么。我急忙追过去，他拔腿就跑，转了几个弯就不见了……”

邓中夏果断地说：“马上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立即查清着火的原因。”

苏兆征说：“对！”

他们回到门口，好多人在乱嘈嘈地嚷着：“怎么办？”“纠察队也没住处了。”“犯人关在哪儿呢？”……

纠察队总教练徐成章，急得在一旁抹泪：“损失实在太大了，太大了！”

邓中夏过去，安慰说：“哭什么！不要紧！”

他通知李森：“马上把各部负责人，叫到这里来开会。”

人们陆续聚集过来。

周围的余烬，尚未完全熄灭，仍然缓缓地冒着一股股黑烟。

邓中夏叉开双腿，站在瓦砾堆上，镇定地说：“同志们，今天这场大火，看来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也不是偶然的事。不久前，发生了中山舰事件，现在，又有人把我们的罢委会烧了，这难道是毫无联系的么？不，绝不会的！我看，这恐怕是有人企图发动政变的信号！不过，大家也不要怕，不要泄气，更不要急，我们要是乱了步子，几十万罢工工人就更乱了。现在，重要的，是马上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修！”

他问招待部主任：“我们哪儿还有空房？”

招待部主任说了几个地方。

邓中夏对李森说：“马上把各部分到那里，明天照常办公！”

李森点了点头。

邓中夏又问：“棚子工会的人来了没有？”

有人说：“来了。”

邓中夏吩咐说：“你们马上回去发动全体会员，明天就动手，尽快把房子盖起来，不单要快，还要盖得比以前更整齐，更好！叫那些反革命看看，我们工人阶级是有能力的！”

人们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精神振奋起来了。

第二天，邓中夏到各处看了看，见人们已经纷纷干起来。有扛木板的，钉钉子的，安电线的，正在各处忙着，有的把床铺、灯线都已经快弄好了……

不久，烧成灰烬的东园废墟上，又立起了一排排高大、整洁的葵棚和许多崭新的建筑，虽然形式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但却显得更加整齐、更加美观大方了。

由有关方面专门组织的“审查财政损失委员会”，对罢工委员会的帐目进行了认真的清查，结果证明罢委会所有帐目都毫无差错。这样一来，火烧东园事件发生后，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的威信不但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相反在罢工工人心目中更为提高了。敌人的破坏阴谋又一次遭到可耻的失败。

九、谈判斗争

从 1925 年 6 月 19 日起，到 1926 年 10 月 10 日，省港罢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停止封锁香港、自动结束罢工，省港罢工历时 16 个月。这是中国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罢工的态度，以广东政局为转移，时软时硬，罢工工人经历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

1925 年 9 月 1 日，香港小商人的组织各邑商会联合会致函省港罢工委员会，表示要派代表来谈判解决罢工问题。这是香港英国当局表示愿意谈判的第一声。

9 月 28 日，香港各邑商会联合会代表谢树棠等 8 人来到广州。10 月 1 日，他们发表《香港各邑商会联合会宣言》，宣称该会只求局部解决纠纷，恢复交通，回复工商原状，政治问题，则须双方政府交涉解决。

鉴于此，省港罢工委员会则提出《香港罢工工人恢复工作条件》、《广州及沙面罢工工人恢复工作条件》、《香港学生联合会之要求条件》共 30 条，交给各邑商会代表，请他们转给香港英国当局。这些条件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罢工开始时提出的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

各邑商会联合会代表回香港后，把这 30 条转交香港英国当局时，却被总督金文泰教训一顿：“谁教你们带条件回来？”

金文泰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原来，这时候，香港英国当局正全力支持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部，从东南两路会攻广州，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在香港英国当局扶持下的军阀一旦得手，必然镇压罢工，哪里还用得着谈判呢？

可是，陈炯明、邓本殷部节节败退，国民革命先后收复潮汕、高阳，统一广东。香港英国当局利用军阀推翻国民政府、镇压罢工的幻想破灭了。

不久，香港英国当局宣布，派遮打、宾那、周寿臣、罗旭和 4 人为全权代表，赴省谈判解决罢工问题。但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到来，香港英国当局却另派李右泉等 8 名华商代表来省谈判。

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问华商代表：你们是否代表香港政府？是否有权解决罢工问题？

华商代表回答：我们不代表香港政府，只代表华商，无权解决罢工问题，只商量经济条件。

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对华商代表说：我们是反对香港英帝国主义，并非反对华商。华人与华人谈判，太不好看。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也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谈不上根本解决。诸位同胞来省，我们很欢迎，很感谢。请转告香港政府，所派的 4 名代表，放心来省，我们早就准备诚意解决罢工了。

为什么香港英国当局迟迟不派已定的 4 个全权代表来广州谈判，而派华商代表来谈经济条件呢？原来，香港总督金文泰已经看到广东政局正发生变化。

这时候，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采取让步政策，国民党右派纷纷回广东活动，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政府隐隐发生动摇。金文泰认为，广东将要发生改变，何必派全权代表去谈判呢？

但是，金文泰期望的广东政变没有发生。1926年3月19日，他又宣布，派辅政司、律政司、华民政务司为代表，赴省谈判。

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金文泰盼望已久的广东“政变”终于出现了。他原定的3名谈判代表不派了。从此，香港英国当局对罢工的态度就强硬起来。

4月，香港英国当局派辅政司金培源赴省。他不找省港罢工委员会，却找广州市长伍朝枢作“非正式谈话”。

金培源返回香港后，香港政府即发表布告，称本年4月8日、9日，辅政司金培源在广州与伍朝枢在解决罢工正式会议之前，先行作非正式谈话。彼此敞开心扉，关系融洽。金培源表示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间工资及不能复工的损失赔偿，一律不给予。

去年，李右泉等8名华商代表来省谈判经济条件时，曾就罢工期间工资及不能复工的损失问题达成协议，由香港商人出钱解决。当时，香港政府顾及自己的面子，虽没有公开表态，但已默许。

现在，香港政府竟然宣布对于罢工期间工资及不能复工的损失赔偿，一律不给予，推翻华商代表同省港罢工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态度变得极其强硬。

1926年6月5日，广东国民政府应罢工工人的要求，致函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问题。香港政府表示香港罢工已成为过去的事件，不准备谈此问题，只同意与广东政府谈判排斥英货问题的解决。

7月15日，中英谈判在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举行。

英国政府历来只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广东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派同等数目的、同等地位的代表，举行正式的平等的中英谈判，表明英国政府已经承认广东国民政府。

参加中英谈判的双方代表是：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顾孟余；英国方面是香港政府律政司凯普，华民政务司洽利法斯，沙面英国总领事白利安。

在15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只是由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致了一篇《欢迎辞》。

在16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国民政府提出了3个问题：

为什么英国杀我中国人（指沙基惨案）？

为什么香港要封锁广州？

为什么不接受解决罢工的条件？

英国代表表示，对这些问题，过3日答复。

在19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英方答复：

沙基惨案，是“中国先开枪”，英国不能负责；

香港没有封锁广州，而是广州方面封锁了香港、沙面；

省港罢工是少数人强迫的，罢工要求不能接受。

在21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举出证据，说明英方完全是无理抵赖。

谈判至此，国民政府代表提出解决办法：组织公正的第三者法庭处理（即国际仲裁），但此事须延迟时日。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应该：

一、英方保证不再发生沙基惨案；

二、英方抚恤沙基惨案死伤者家属；

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量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

款项，由双方共同负担。

英方代表对组织第三者法庭，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的3条件，表示反对，声言解决罢工问题不能包括赔偿在内。

国民政府代表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之前，先行借款，由中英双方分别负担。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胜，英方负担的款项，由国民政府偿还。

英方代表表示反对。提议实业借款贷予中国，作为开辟黄埔港口的费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条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借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帐各1人。

在23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中英双方各自提议写成条文，交给对方。双方代表都表示要请示本国政府。中英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这次中英谈判，虽未破裂，但已延期，延到何时，要看英方的态度。

当时，国民革命军已誓师北伐，而香港英国当局已经宣布拒不接受罢工要求，怎样才能解决罢工问题，以便集中力量支援北伐呢？

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黄平等一同去向鲍罗庭请教。

鲍罗庭提出，凡进口的外国货物关税，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遣散罢工工人的费用。罢工工人每人先领100元，回香港或别的地方找工作。6个月后，仍没有找到工作的，可回广州，罢工委员会仍然供其食宿。

经邓中夏、鲍罗庭分别向省港罢工委员会、国民政府协商通过，2.5%的附加税，由国民政府通知各国领事执行。

10月1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结束罢工，以便全力以赴地进行北伐，使省港罢工的斗争，变为全国一致的联合奋斗。自此，罢工工人大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斗争中去了。他们和东征南讨一样，组织了宣传队、运输队、卫生队。运输队有3000多人，他们在艰难条件下，不怕困苦，来回在湖南广东间的五岭山脉，运输粮食弹药，抢救伤兵，侦察敌情，给了北伐军极大的帮助。

伟大的省港大罢工，虽然为了北伐的胜利进军而结束了，但罢工委员会各个机关仍然继续存在着，罢工工人仍在广东工人中起着革命的先锋作用，香港的工会也还秘密存在，直到1927年10月，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广州用武力解散罢工委员会后，罢工的组织才算最后结束。

十、光辉篇章

省港大罢工，虽然没有给工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它的影响，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是不能以‘罢工’的意义来解释的”。

这次罢工，对外给了英国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以沉重的打击，对内统一了广东，巩固了民主革命的基础，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急剧地向前发展，这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就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罢工中，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顽强的斗争，完全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民族民主运动的先锋，是争取国家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的战士，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省港大罢工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罢工中，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权性质的组织，它不但把广大的省港工人组织起来，共同对敌斗争，而且领导了广东的社会民众团体。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学习掌握政权、管理政治的尝试。这种创造性的尝试，大大丰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在罢工委员会中，还培养了大批的群众组织者、宣传员、鼓动员。这一切，都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省港大罢工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罢工以前，香港和沙面的工人是很分散的，派别多，行会习气重，很不统一。罢工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工人逐渐认识到工会统一的意义，便努力进行工会统一的工作。在香港，首先联合起来的是机器工人，他们组织了金属业总工会；其次是运输工人，他们组织了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这些工会都是以产业联合的。1926年4月15日，香港总工会成立了，从此香港的工会都统一在香港总工会之下。它们已不再是独立、分散、弱小的组织了。在广东，除了强大的罢工委员会以外，广东各地，很多县都逐渐建立了地方工会的组织。1926年4月，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罢工工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广东的农民运动也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在1926年初，参加农民协会的就有60多万农民。

省港大罢工的胜利，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外，就是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全国人民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纷纷举行会议、示威运动，给予罢工工人以物质支援；在外国办的企业中、学校中，工人举行了罢工，学生退出了学校。唐山、上海等地的工人，他们捐款，举行集会和示威，打电报慰问，用种种方法来支援罢工工人。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国外华侨也给予了罢工工人很大的援助。沙基惨案发生后，苏联驻广州代理领事赫尔曼曾致函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深切同情，并希望我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罢工期间，苏联工会曾派4个代表来广州，并捐款5万多元援助罢工工人。英国各地的工人举行了示威运动，反对英国政府压迫中国工人；日本工人曾几次派代表来广州慰问。1926年6月，在广州的印度、越南、朝鲜等国的侨民举行了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声援我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1926年7月，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工人，又组成国际工人代表团来广州，他们对罢工工人进行了热烈的慰问，并在广三铁路上举行了慰问大会。这些援助，大大鼓舞了罢工工人，他们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孤立的，在他们的后面，还站着强大的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中国人民。

伟大的省港大罢工，不仅是五卅反帝运动的最后支柱，而且是直接促进

北伐的动力，它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出不朽的光芒。

